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清代

河南、山東等省商人
會館碑刻資料選輯

許檀 編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天津古籍出版社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清代

河南、山東等省商人
會館碑刻資料選輯

許檀 編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天津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清代河南、山東等省商人會館碑刻資料選輯 / 許檀
編. —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528-0127-9

I. ①清… II. ①許… III. ①商會—商業史—史料—
中國—清代 IV. ①F729.4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3)第065068號

清代河南、山東等省商人會館碑刻資料選輯

許檀/編

出版人/張瑋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號 郵編300051)

<http://www.tjabc.net>

三河市國源印刷廠印刷

全國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張38.75 插頁4 字數710千字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8-0127-9

定價: 160.00元

全勒石

[illegible]

拓片(一)



拓片(二)



開封山陝甘會館牌坊



睢旗山陝會館琉璃照壁



睢旗山陝會館懸鑼樓



睢旗山陝會館考察



周口山陝會館大殿



周口三岔河口舊碼頭遺迹（現已無存）



周口三岔河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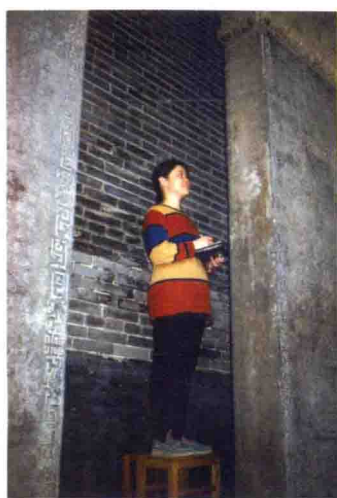
洛陽山陝會館襄陵幫捐款碑



在周口抄碑



聊城山陝會館山門



在聊城抄碑



聊城山陝會館碑廊



荊子關考察



在北舞渡拍碑



祁州藥王廟考察



雁門關城樓



雁門關北上商路



雁門關上的碑群

編輯說明

一、本《選輯》的目的是爲學術研究提供第一手資料，故所錄碑文除加標點符號外，不做任何改動，以存原貌。

二、爲保持資料的完整性，碑文編排係按地域、分會館，同一會館的碑文依時間順序排列。

三、原碑有碑名者均行照錄，凡加《》號者係原有之碑名；原無碑名者，或以碑額爲名，或依據碑文內容擬定，並加注釋予以說明。

四、碑文原缺紀年者，能够確定者增補之，並加注釋予以說明；不能確定者標注“未見年款”“年代不詳”。紀年字體有繁有簡，均存其原貌。

五、碑文和捐款部分的文字和數字既有繁體，也有簡體，還有同一碑中繁、簡參雜者，均盡量保存原貌。

六、碑文漫漶不清或缺損之處，可確定字數者以□代之，無法確定字數者，以“……”、“下殘”、“此處殘損”、“此處漫漶”等標注。

七、碑文中之誤字、缺字，除明顯可據者予以訂正、增補，用括弧【】將其標出外，其餘全部照錄。古體字或異體字一般改爲通行字。

八、因版面原因，捐款部分無法按照原碑格式，只得改排。其中大多是將原來的橫排改爲豎排，也有一些將豎列改爲橫排，主要以方便閱讀爲原則。

前言：商人會館碑刻資料及其價值

商人會館是明清時期各地商人在客居地建立的一種自治組織。關於商人會館的研究，始於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1925 年鄭鴻笙發表的《中國工商業行會及會館、公所制度概論》一文可說是中國學者會館研究的開山之作，不過鄭氏只考察了民國時期。^① 1934 年全漢昇《中國行會制度史》^②一書以會館作為明清時期中國行會的表現形式，對其產生原因、組織形式、經費來源、會館職能，客幫與會館的關係等做了簡要的梳理。

從 20 世紀 20 年代開始，日本學者陸續開展了對中國工商業會館的實地調查，並在此基礎上發表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如 1932 年根岸佶《支那基爾特研究》^③一書依據上海四明公所、徽寧思恭堂、米業嘉谷堂等會館的碑記、章程、徵信錄等資料，對會館的歷史淵源、沿革變遷、組織形式、會計制度、功能特點等進行了系統考察；根氏將會館作為同鄉組織的職能歸納為敦厚鄉誼的社交團體、保護和增進職業利益的經濟團體、奉祀本尊神祇的宗教團體、扶助貧困的善舉團體、共同防衛危險的保護團體、具有家族觀念的準血緣團體等六項，並對其作為經濟團體的特點進行了重點考察。1942 年加藤繁《清代北京的商人會館》一文，利用調查收集的碑銘資料分別考察了正乙祠、顏料會館、臨襄會館等 9 所會館的創建沿革及其性質。^④ 稍後，今崛誠二發表了《河東鹽業同業公會研究》、《近代開封的商業公會》等一組論文^⑤；1951 年仁井田陞出版了《中國的社會與基爾特》。^⑥ 將中國的會館和西歐中世紀的行會加以類比，是這一時期日本學界的主流觀點。

中國學者的實證性研究，如 1978 年李華在整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資料基礎上發表的《明清以來北京的工商業行會》^⑦，1980 年洪煥椿基於蘇州工商會館碑銘的

① 王日根：《中國會館史》，東方出版中心，2007 年，第 4 頁。

② 全漢昇：《中國行會制度史》，新生命書局，1934 年。

③ 根岸佶：《支那ギルドの研究》，斯文書院，1932 年。

④ 加藤繁：《清代北京的商人會館》，《史學雜誌》1942 年第 53 卷第 2 期；收入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中譯本第三卷，商務印書館，1973 年。

⑤ 王日根：《中國會館史》，第 16 頁。

⑥ 仁井田陞：《中國的社會とギルド》，岩波書店，1951 年。

⑦ 李華：《明清以來北京的工商業行會》，《歷史研究》1978 年第 4 期。

清代河南、山東等省商人會館碑刻資料選輯

考察^①，也將明清時期的工商業會館視同行會。1995年彭澤益在《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的《導論》中對圍繞會館、公所的各種觀點進行了梳理，進一步強調“中國行會客觀存在的歷史不容否定”，認為西歐“行會的經濟職能、共有的基本特徵也是符合中國行會的實際的”^②。

1966年美國學者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③一書，打破了長期以來將會館等同於行會的研究範式，他將會館分成試館、工商會館和移民會館三大類，並對各類會館的數量與分佈進行了統計。中國學者中最早挑戰當時主流觀點的是呂作燮1982年發表的《明清時期的會館並非工商業行會》^④一文，他考察分析了蘇州、漢口、上海等地的工商業會館，認為這些城市中的會館屬地域性行幫組織。1990年代以降，對地域商幫和商人組織的關注漸成為會館研究的重點。相關研究如川勝守《明清時代北京、蘇州、上海之廣東會館》^⑤、寺田隆信《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⑥、邱澎生《商人團體與社會變遷：清代蘇州的會館公所與商會》^⑦、吳慧《會館、公所、行會：清代商人組織演變述要》^⑧、孫麗娟《清代商業社會的規則與秩序》^⑨、宋倫《明清時期山陝會館研究》^⑩等。

總之，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對商人會館的研究不斷深化和拓展。就經濟層面而言，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人會館的性質、功能和作用等方面；最近二十年，越來越多的學者更加關注地域商幫的經營活動以及商人組織的發展變化。此外，一些中青年學者的研究視野進一步擴展到社會、文化領域。^⑪

與以上各家學者有所不同，筆者對商人會館的關注，是從對明清時期商業城鎮的發展和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層級考察切入的。或者說，筆者最初的目的乃是苦於有關地區性商業中心的文獻資料極為匱乏，不得不眼睛向下，到基層去尋找資料。

明清時期是中國城市發展的重要轉變時期，大量商業城鎮的湧現是其中最重要

① 洪煥椿：《論明清蘇州地區會館的性質和作用》，《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2期。

② 彭澤益：《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中華書局，1995年，第2、第8頁。

③ 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臺灣學生書局，1966年。

④ 呂作燮：《明清時期的會館並非工商業行會》，《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2期。

⑤ 川勝守：《明清時代的北京、蘇州、上海之廣東會館》，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經濟史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

⑥ 寺田隆信：《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吳廷璦等主編：《鄭天挺紀念論文集》，中華書局，1991年。

⑦ 邱澎生：《商人團體與社會變遷：清代蘇州的會館公所與商會》，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1995年。

⑧ 吳慧：《會館、公所、行會：清代商人組織演變述要》，《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⑨ 孫麗娟：《清代商業社會的規則與秩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

⑩ 宋倫：《明清時期山陝會館研究》，西北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

⑪ 筆者所見相關研究主要有：王日根《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該書經增補修訂以《中國會館史》之名由東方出版中心於2007年再版；周榮《明清社會保障制度與兩湖基層社會》（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馬驍《河南晉商會館建築研究》（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等。

的特點之一。商業城鎮的發展既是區域經濟發展和商品流通的產物，也是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過程和重要組成部分。其中，除作為流通樞紐而崛起的運河、長江、沿海較大的商業城市之外，作為地區性商業中心^①發展起來的城鎮為數更多，它們有些為府城或州、縣城，還有相當一部分在行政建制上不過是一個鎮。對此類城鎮的考察除江南地區成果較多之外，其他地區幾為空白。地區一級的商業中心到底發展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其商業規模如何？這些商業城鎮的分佈狀況如何？等等……均缺乏深入細緻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資料缺乏。因為此類城鎮一則非國家稅關之所在，無稅收檔案可資查閱；二則地方文獻多由官宦士紳撰寫，經濟發展並非他們的關注重點，故而傳統文獻中有關商人經營和市場活動的記載極少，這一缺憾在北方地區尤顯突出。不過，明清兩代各省商人大多會在經商地點建立會館，這些會館的創建、重修都是由商人集資而成，並多鑄諸貞珉以冀永久，從而為我們保留了一批十分珍貴的商業資料。

最早對商人會館碑刻資料進行系統收集的當推日本學者仁井田陞，他在 20 世紀 40 年代曾對北京的工商業會館進行調查，其調查成果後由佐伯有一和田仲一成兩位學者編輯成《北京工商基爾特資料集》^②，從 1975 年起陸續出版。這套資料共收錄會館碑文 200 餘通，並附有相關的訪談記錄。國內方面，1959 年江蘇省博物館所編《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③，收入蘇州、南京、上海、無錫等地商人會館碑文 100 餘通。李華在 1960 年代也對北京的工商業會館進行了調查，並將調查所得輯成《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業會館碑刻資料選編》^④於 1980 年出版，收入碑文 90 餘通。1980 年代以降陸續出版的還有《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清代工商行業碑文集粹》等工商會館碑刻資料^⑤；《上海碑刻資料選輯》、《明清佛山碑刻文獻經濟資料》、《廣東碑刻集》、《明清山西碑刻資料選》等^⑥也收錄了一些商人會館碑文。不過，目前已出版的會館碑刻主要集中在東部較大的城市，而廣大內陸地區的商人會館碑刻遺存絕大部分尚未被學者關注；對商人會館碑刻資料進行分地域、較系統

① 關於流通樞紐城市和地區性商業中心的劃分，請參見許檀《明清時期城鄉市場網絡體系的形成及意義》，載《中國社會科學》2000 年第 3 期。

② 佐伯有一、田仲一成編：《仁井田陞博士輯北京工商ギルド資料集》，東洋文化研究所，1975～1983 年。

③ 江蘇省博物館：《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三聯書店，1959 年。

④ 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業會館碑刻資料選編》，文物出版社，1980 年。

⑤ 蘇州博物館等：《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彭澤益：《清代工商行業碑文集粹》，中國古籍出版社，1997 年。

⑥ 上海博物館：《上海碑刻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廣東省社科院歷史所等：《明清佛山碑刻文獻經濟資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 年；譚棣華等：《廣東碑刻集》，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張正明等：《明清山西碑刻資料選》，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明清山西碑刻資料選（續一）》，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 年；《明清山西碑刻資料選（續二）》，山西經濟出版社，2009 年。

清代河南、山東等省商人會館碑刻資料選輯

的收集、整理亦屬欠缺。

筆者從 1990 年代開始對商人會館遺存進行調查，迄今已跑了十來個省的幾十個縣、市，收集會館碑刻數百通。不過，對這些碑刻資料的使用筆者頗費了一番思考：如何將碑文所含信息更多地展現出來？特別是其中的捐款部分包含的商業信息最為豐富，但卻很少被人關注，怎樣才能更好地將其加以利用，以彰顯各商業城鎮的不同特點？乃是筆者花費精力最多的部分。在《明清時期山東商品經濟的發展》^①一書中，筆者利用聊城山陝會館碑文進行了最初的嘗試；2003 年發表的《清代河南的商業重鎮周口》^②一文或可算是第一個較為成功的個案，此後陸續對河南賒旗、朱仙鎮、北舞渡、開封、洛陽、荊子關，山東周村以及張家口、歸化城和錦州等十餘個城鎮進行了較詳細的個案考察，對它們各自的發展脈絡、商業構成、商業規模和腹地範圍等得出了一些較為具體翔實並盡可能貼近歷史實際的認識。

商人會館碑刻資料所反映的內容十分廣泛，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會館創建、重修的緣起和經過；其二，會館的經費來源、財務管理方式和收支狀況；其三，會館的慶典活動、公益事業和日常管理；其四，會館的商業活動、行業規範以及內外交涉；此外，則因時、因地、因館而異了。由於研究目的不同，筆者的關注點與以往有較大差異。就筆者管見，商人會館碑刻資料至少可在以下方面為我們提供其他資料無法比擬的信息：

（一）商人會館的創建、重修、擴建經過，可反映該幫商人經濟實力的增長過程，也間接地反映出會館所在地的商業發展脈絡。僅舉二例：

1. 周口山陝會館從康熙三十二年創建，至咸豐二年最後完工，時間持續達 150 年之久。其間重修和擴建工程進行了十餘次，從乾隆中葉開始工程規模明顯增大，特別是嘉道年間每次都開支浩繁，如：嘉慶五年至七年修建春秋閣和歌舞臺耗銀二萬餘兩，嘉慶末至道光初的增修也費銀二萬餘兩；道光十六至十八年的工程開支二萬陸仟餘兩。^③如此頻繁的重修、擴建工程，顯示了山陝商人經濟實力的不斷增長，也反映出周口商業在這一百數十年間的持續發展。表 1 是周口山陝會館的建築年表，請參見。

① 許檀：《明清時期山東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

② 許檀：《清代河南的商業重鎮周口》，《中國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

③ 詳請參見許檀《清代河南的商業重鎮周口》一文。

表 1 周口山陝會館創建和重修、擴建工程一覽表

年 代	建 築 與 修 繕
康熙三十二年	會館創建
康熙五十二年	添建河伯、炎帝二殿
康熙五十六年	建藥王殿、東廊房
康熙六十一年	建財神殿、西廊房、禪房僧舍
雍正九年	重修大殿，添建香亭
雍正十三年	建舞樓、山門
乾隆八年	建老君殿
乾隆十五年	建鐘、鼓二樓
乾隆三十年	建馬王殿、酒神殿、瘟神殿、石碑坊、馬亭、戲房
乾隆四十六～四十八年	重修香亭、鐘鼓樓、藥王殿、瘟神殿及馬亭、戲房， 綵繪諸殿、兩廊，鋪砌內外廟院
嘉慶五～七年	建春秋閣、歌舞臺
嘉慶二十年～道光二年	立牌坊 2 座、建廊房 14 間、客庭 10 間、看樓 10 間、 作坊 20 間，並修院牆、砌甬道、施綵繪
道光十六～十八年	重修殿宇、香亭、石舫，“崇其基址，高其棟宇”
道光三十年～咸豐元年	建後院饗亭，修葺前後殿廊樓閣
咸豐二年	全部落成

2. 錦州天后宮為福建、江浙兩幫商人所共建，亦即福建、江浙兩幫商人會館。會館的修建肇始於“雍正乙巳，實成於乾隆辛巳”，乙巳為雍正三年（1725），辛巳為乾隆二十六年（1761），歷時 36 年。乾隆二十八年“永久千秋”碑^①記載了其間天后宮所建工程及其用款，我們據以列成下表：

表 2 雍正乾隆年間錦州天后宮修建工程及其開支一覽表

年 代	建 築 工 程	支 出
雍正三年	建正殿、大殿、東西配殿，圍牆、二門	1980 兩
雍正五年	建頭門三間	485 兩
乾隆六年	圍砌隱碑、東西轅門引道	204 兩
乾隆十年	重建二門、兩廊	675 兩
乾隆十七年	買二門外空地一處	550 兩
乾隆二十四年	起蓋戲臺、重建頭門	1200 兩
乾隆二十五年	建東西榭屋 18 間	940 兩
乾隆二十六年	重建大殿、東西配殿、頭門、二門、庫房、廚房	2700 兩
合 計		8734 兩

① 錦州市博物館藏，詳請參見本書附錄三，“天后宮碑文”部分。

清代河南、山東等省商人會館碑刻資料選輯

上表可見，錦州天后宮在創建之初規模有限，經乾隆年間的擴建、重修漸臻完備。其中，雍正年間耗資 2460 餘兩，乾隆初年的擴建每次支出不過數百兩，而乾隆二十四至二十六的三年共支出 4800 餘兩，超過以往的總和，顯示出乾隆中葉兩幫商人實力較前有很大增長。嘉慶初年天后宮又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重修，耗資 48000 吊；集資款項除支付全部開銷外還有大量結餘，工程結束後，兩幫商人將餘款“分交泰來、萬隆、祥茂三大店”存貯生息，以利息所得作為“遞年開堂、聖誕普度”、“住持僧香火”及“廟內歲修”的經費，使天后宮每年的慶典及修繕經費得到長期保障。此次集資，從“乾隆六十年起至嘉慶五年止”共捐錢 92000 餘吊，平均每年 15000 餘吊。與乾隆中葉相比，兩幫商人的實力又有增長。

又據福建商幫嘉慶九年所立《天后宮碑記》記載，雍正三年會館始建之時，福建幫捐銀 1930 兩，而江浙幫捐銀僅 118 兩；雍正五年起蓋頭門，福建幫捐銀 485 兩，江浙幫也只捐了 45 兩。看來當時江浙商幫的實力遠不如福建幫。而到乾隆三十九年，天后宮重修耗資 5530 餘吊則係福建、江浙兩幫商人均攤；嘉慶年間天后宮的重修費用以及每年的日常開支，也是由兩幫商人均攤，福建、江浙兩幫商人實力已不相上下了。^①

筆者所見河南、山東等地會館中，明代或清初的修建工程集資多在一二百兩，最多不過三五百兩。如隆慶年間清化鎮創建大王廟的集資為 200 餘兩；康熙十年泰安鹽當會館的重修集資約計百兩，康熙二十二年增建配殿集資 200 餘兩。雍正、乾隆時期已有不少會館的修建開支上昇至千兩級，如前述雍正年間錦州天后宮的草創耗資 2400 餘兩，乾隆中葉朱仙鎮山陝會館重修集資 9700 餘兩，洛陽潞澤會館的創建耗資更高達 36000 餘兩。嘉道年間超過萬兩的修建工程數量更多，如周口山陝會館的三次重修集資均超過二萬兩，洛陽山陝會館的重修耗銀 25000 餘兩；聊城會館嘉慶初年的重修耗銀 49600 餘兩，天津鍋店街山西會館道光初年修建春秋樓的集資至少有 20500 餘兩。會館修建規模的梯級增長，既反映了各地商幫經濟實力的增長過程，也大致勾勒出明清時期華北各地商業城鎮的發展脈絡。

（二）會館的創建、重修都是由商人集資而成，集資金額以及參與集資的商號數量、行業可從不同角度反映出該商幫以及城鎮的商業規模和特色。

商人捐款部分以往很少被關注，有些碑刻資料在出版之時甚至將其略去，而捐款名號及其金額恰恰是研究商人經營活動和市場實態最具價值的資料，至少在以下幾方面可為我們提供其他任何資料無法替代的信息：

^① 詳請參見許檀《乾隆一道光年間的錦州商業》，載《史學月刊》2011 年第 4 期。

1. 會館的集資金額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該商幫乃至該城鎮的商業規模。會館集資既有以銀兩計，也有以錢計者。以銀計者，如前述周口、洛陽、天津等會館在清代中葉的重修集資均高達二三萬兩，聊城會館幾近五萬兩；而同光年間賒旗山陝會館的重修耗資 87700 餘兩，光緒末年天津廣東會館的創建集資達九萬餘兩。以錢計者規模可能較小，如北舞渡山陝會館嘉慶十三年購地、建房等共計用錢 223 千文，道光六年添建牌坊用錢 650 千文，咸豐二年油坊衆商增建老君殿支出 2435 千文，同治初年重修會館支出爲 2074 千文。道光年間開封山陝會館重修牌坊集資 1027 千文，同治初年修後道院集資 2093 千文。也有規模較大者，如錦州天后宮嘉慶初年的重修共集資 92000 餘吊；荊子關山陝會館道光年間的重修集資約在七八千～一萬餘串。

2. 參與集資的商人商號數量可從另一角度反映該會館的商業規模。碑文所見，明代隆慶年間清化鎮創建大王廟時參與集資的商人估計超過五百；雍正年間朱仙鎮山陝會館增建牌樓，參與集資的翼城縣商人即有三百餘家；乾隆一道光年間朱仙鎮、周口、洛陽、周村、荊子關等會館的重修，參與集資的商人商號均超過千家。規模較小者如北舞渡山陝會館，道光初年參與捐資的商人有 340 家，同治六年碑開列的行商、坐賈共計 290 餘家。

3. 會館集資採用的抽厘率是目前所見可據以對商業規模進行折算的最有效的手段。會館集資方式一般分爲抽厘、認捐兩大類。所謂抽厘是依據各商之經營額或貿易量按一定比例提取厘金；認捐雖屬多寡自便，實際上也是依據財力大小。道光二年周口《山陝會館春秋閣院創修牌坊兩廊看樓客庭工作等房鋪砌甬路院落佈施抽積銀錢碑記》對此有較具體的說明：

“斯舉也（指會館重修），共計費銀貳萬有奇。其所從來者有二：一則出之於吾鄉之鋪戶也，開設有地而子母常權，承帝之庥，當思酬帝之德。於嘉慶十四年挨行募化，量本金之大小爲捐數之重輕，統計得銀壹萬陸千貳佰兩。一則出之於吾鄉之行商也，來往不時而懋遷有術，既爲山陝之人，應預山陝之事。於嘉慶十四年仍循往例千錢抽一，至道光元年共得銀壹萬貳仟玖佰兩。”^①

按照該碑所言 1‰ 的抽厘率折算，嘉慶年間周口山陝會館的年經營額約計 240 萬兩，道光年間有所增長，達 290 萬兩。又據道光十八年《重修關帝廟歲積厘金記》所鐫，從道光六年至十五年的九年間，雜貨行抽厘共計 7915 兩，平均每年 879 兩零；以 1‰ 的抽厘率折算，雜貨一行的年經營額至少可達 80 餘萬兩。進一步的細

① 碑文見本書第八五、八六頁。